

# “市场工具论”批判

林 金 忠

---

**内容提要** 我国流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存在着明显的认识偏差,即“市场工具论”这种错误认识。所谓“市场工具论”即是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工具或手段,由此断言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相干。“市场工具论”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中心论”,二是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和狭隘的。“市场工具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 市场经济 资源配置 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林金忠,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的确立。这一目标的确立,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目标的提出并不等于对目标本身已经有了清晰而完满的认识。事实上,人们对“市场”、“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仍是相当有限的,仍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本在全国同类教科书中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材的第一章中,首先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切割为两块,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随即宣布这两块之间是互不相干的。用该书的话来说:“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照此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在“市场经济”头上戴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由彼此外在的或互不相干的两项内容所组成的,即“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市场经济”。那么,究竟何谓“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条件下”呢?该书给“社会主义条件下”列出三项规定性,即:“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此外,该书还作了进一步阐发,称“社会主义条件下”意味着“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有共产党领导,有公有制为主体,有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内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也都采取类似的提法。那么究竟何谓“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被界定为“市场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经济形式。按此定义,“市场”被理解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正如计划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样;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区分仅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上的不同。国内已出版的多数同类教科书,基本上也都按此理解。

在上述这种认识中,一个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块被视为互不相干的内容何以能够“组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呢?或者说,何以能够给“市场经济”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并没有对此作出必要的论证。但从该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中,我们还是看出了作者的基本想法: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因而它仅仅是手段,正如计划也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因而也仅仅是手段一样。手段就是工具,工具自然是“人人皆可得而用之”的。因此,资本主义可以使用市场这个工具,社会主义自然也能用,正如社会主义可以用计划这个工具,资本主义也在用一样。于是乎,将“社会主义”这一顶帽子戴在“市场经济”的头上,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被“组合”出来的。显而易见,在这种思维逻辑中,一个关键的或核心的命题是:市场只是工具。正因为市场只是工具,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能搞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市场只是工具,所以才断言“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或曰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是不相干的。这个关键或核心命题所蕴涵的思想认识,本文称之为“市场工具论”。我们认为,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片面的和狭隘的认识,是我国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认识偏差。这样一种片面的和狭隘的认识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资源配置中心论”,二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理论认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前我国普遍流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乃是这两种思想源泉的混合。

## 二

西方正统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的重心放在资源配置问题上,这一传统或许可追溯到 A. 马歇尔。不过,对此做了较好阐述的当数英国经济学家 L. 罗宾斯。在 1932 年初版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罗宾斯写道:“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看作是目的与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又说,“给定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换言之,罗宾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于资源配置问题,或至少把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资源配置中心论”正是由此而来,它把经济学研究引入了解决人的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关系的狭窄领域。此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没有摆脱“资源配置中心论”的窠臼。比如,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第 16 版)中写道:“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和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制。”不过,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源配置中心论”才被发展到了极致。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稀缺资源如何通过市场本身的自发作用(即所谓市场机制)而在社会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的形式。在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下,资源配置问题被归结

随便翻开国内编写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例如:魏杰主编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市场与政府》,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叶德勋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程》,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29 页;卫兴华等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7 页;袁木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 页。

Robins. L.,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35, p. 16.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英文第 16 版),华夏出版社 1999 年中译本,第 21 页。

为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而市场机制的作用则是通过自由竞争下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自发地实现的。于是,市场经济就被归结为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又被归结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即市场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把这样一种资源配置视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因此我们才称之为“资源配置中心论”。这是一种高度简略的理论体系,其所以是高度简略的,根源在于其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这个假设使得人的经济活动从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中割裂和孤立出来,亦即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外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舍掉了。从单纯形式上看,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源配置中心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颇具逻辑严密性的理论系统(尤其是其微观经济学);但从思想内容来看,这个理论系统是相当贫乏的,所研究的仅仅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下的纯技术性关系,即有关需求(目的)与稀缺资源(手段)之间的纯粹的技术性关系,而市场交换行为背后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则被一概撇开了。由于单纯的技术性关系根本就不足以解释市场机制何以能够存在并能够有效运行,因而“资源配置中心论”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首先,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所隐含的完全信息假设,显然是过分严格的,因而不切实际的;因为按照这一隐含假设,实际上意味着经济活动主体(被新古典经济学简化为两种人,即生产者与消费者)具有“全知”、“全在”和“全能”的特性,几乎具备了“上帝”才具有的秉性。而一旦放松这一过分严格的隐含假设,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的内在逻辑便会出问题。斯蒂格利茨已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作为新古典模型之典范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并不能保证实现所谓的帕累托效率。其次,“资源配置中心论”完全忽视了、也无法解释大量非市场交换现象的存在。霍奇逊指出:“有许多交换并不通过市场,而是在其他活动空间进行”;“尽管有同样的或相近的替代品,但买者却乐意购买旧卖主的物品,而不去‘市场’考虑另一种选择。这种固定的交换或叫‘关系性’契约,同所谓有更直接的竞争性和选择性的环境——市场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应该说,这种说法已经意识到信任关系在交换活动中的重要性了,它是符合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观察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无视这一点。再次,“资源配置中心论”也没有考虑到决定交换行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权利关系。马克思说,交换关系是以“彼此承认对方是所有者”为前提的。因此,交换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是双方都拥有对交易对象的权利。科斯也说:“权利的界限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法律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利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这种权利是以交换活动主体彼此相互承认为先决条件的,它要求社会具备广泛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正因如此,泰勒在《市场的伦理基础》一文中说:“交换,如果发生的话,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承认之中。”他指出,财产权利只能存在于人类共同体契约之内,“除了共同体契约之外,人一无所有”,“权利只有在道德共同体的要求得到认可时才会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资源配置中心论”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事实上,在交换和市场机制的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多层次结构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它构成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系统层次结构作简要的分析。首先,这个社会系统的表层结构,就是在交换活动背后并支撑着交换活动的权利关系和信任关系。经济学者们更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章。

霍奇逊, G. M:《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1页、第49页。

参见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9—292页。

多地谈论权利关系之作为交换的基础,而对信任关系则较少予以关注。其实,信任关系以及由信任关系联结而成的信任系统乃是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之一。信任在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它使得原本不可能的交换关系成为可能,如信任的中介连锁关系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它弥补了交易合同的不完备性对交换所造成的障碍。权利与信任之间是密切相关、互为条件的:权利乃是信任关系得以扩展的外在条件之一,而信任则是权利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条件之一。其次,这个社会系统的中间层结构,是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主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规范。其核心内容在于形成某种社会规则和秩序,市场交换的一整套规则和秩序已包含在其中了。这一系列正式的制度规范支撑着表层结构中的权利和信任关系,同时它又根源于下文将述的深层结构,所以它是居于中间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规范意味着某种行为约束,亦即个人行为的可选择范围的缩小;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制度规范却能够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处于有序状态,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经济行为的社会整体优化。再次,这个社会系统还有一个深层结构,即既不属于上述两个层次结构,同时又支撑着上述两个层次结构的复杂的社会因素之总和。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如国家政治结构(体现统治者意志和政权性质)、传统习俗(一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文化观念(如宗教信仰、真善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深层结构中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属于人类生存本能之残存倾向(如自利与合作),有些属于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心理积淀(如血缘族亲观念),有些则是特定知识积累状态下的产物(如信仰和意识形态)。上述三个层次的结构在互动过程中有机地相互交错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因而必须把它内在(而不是外在)地包含在市场经济的概念之中。若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的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难以想像的,因而也谈不上所谓资源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中心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将这个社会基础从市场经济概念中完全抽象掉,使市场经济变成纯粹的技术性关系,即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市场工具论”所理解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当我国国内教科书把“市场经济”仅仅视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且视社会制度与之互不相干时,其思想明显地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

### 三

“市场工具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曾经盛行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分析将进一步揭示,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中心论”是一脉相承的。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那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中,米塞斯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论断。作为对这一论断的回应,兰格和勒纳提出著名的“兰格—勒纳答案”,后人笼统地称之为“兰格模式”。这个模式在兰格和勒纳那里已奠定理论基础,后经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们(如布鲁斯、拉斯基、锡克等)的拓展和修

关于信任的作用及其机理,参阅科尔曼·詹姆斯:《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12 章;福山·弗兰西斯:《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比如,A 与 B 之间有信任关系,B 与 C 之间有信任关系,虽然 A 与 C 之间没有信任关系,但 A 有可能因为信任 B 而信任 C。这就是一种信任的中介连锁关系。

正,形成了各种版本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兰格模式”可以用一个等式来加以简明概括,即:“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国家所有制”+“市场”。换言之,国家所有制在“兰格模式”中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又是一个给定的外生因素,亦即在“市场”的头上戴上了“国家所有制”的帽子。这样的“市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市场,而只是一种“模拟的”市场,即中央计划委员会通过“试错法”,不断地调整价格体系的参数,亦即不断地矫正计划当局的“核算价格”与市场“需求价格”之间的偏差,从而起到了“模拟”市场机制的职能,以实现市场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用兰格的话来说,“(错了再试的)价格决定过程与竞争市场中的过程很相似。中央计划当局(也能)起到市场的作用”。或用布鲁斯的话来说,“中央计划委员会在没有本来意义的市场的情况下执行了一些市场的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在“兰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如“里斯卡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中立资本模式”、“南斯拉夫自治模式”等。这些模式从不同侧面修正了“兰格模式”,但都没有摆脱“兰格模式”所包含的思维范式:在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下引入市场机制。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些模式是以不同方式将“兰格模式”的上述等式拓展为:“市场社会主义”=“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市场”。

我们认为,不论哪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未能涉及到(更谈不上解决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经济行为的动力和激励问题,经济活动中的权、责、利相协调问题,信息不完备问题,以及制度运行成本问题,等等。其所以未能涉及到这些根本性问题,主要就因为这些模式都把各自所主张的“公有制”当作外在于“市场”的既定前提预设下来,同时又回避了财产制度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由米塞斯提出的要害问题。其实,“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思想上恰恰就渊源于新古典主义的“资源配置中心论”。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下把经济活动理解为资源配置,而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则被理解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价格与供求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纯粹技术性关系。在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概念中,已经抽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正是以此为理论出发点:既然市场机制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关系,那么市场就如同一种“机械装置”,是可以被设计、被模拟、被移植和被利用的工具或手段;既然市场只是工具或手段,它自然便与社会制度无关,因而便可以与任意一种社会制度外在地结合在一起了。上述那两个等式就是这样一种思维逻辑的反映。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这种内在的思想渊源联系,看得十分清楚,他一针见血地说:“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在传播和延续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新古典模型(或者其前身)对经济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也对标准新古典模型提出了质疑”。在我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布鲁斯·W.:《市场社会主义》,载《外国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在这个等式中,右边第一项“某种形式的公有制”比前一个等式的“国家所有制”等更具一般性,所以说该等式拓展了前一个等式。

兰格晚年曾沉醉于把市场视为类似于计算机的机械装置,这一点可以从他的60年代发表的两部论著中很清楚地看到,参见:Lange, O. R.,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Cybernetics*,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65;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in M. Dobb (ed.), *Socialist, Capitalist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第2页。

国流行观点中,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外在地组合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宣称“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如此云云,其思维范式明显地来源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

#### 四

“市场工具论”观念似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影响可谓深远。20 世纪 50、60 年代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是走“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子,即在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在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提法,我们从中也隐约可见“市场工具论”影响之思想痕迹。如前所述,在我国国内教科书流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依然还保留着“市场工具论”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

事实上,“市场工具论”迄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在思想认识上,它使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和改革实践者们相信,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是相互外在的或互不相干的,所谓“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就是此意。“市场工具论”也在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认识,比如,既然市场与社会制度无关,那么产权制度改革压根儿就不是必要的了。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如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价格闯关”之举,乃是典型的以“市场工具论”为思维导向的做法,仿佛只要“放开”价格就会有“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了。“市场工具论”也是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深层原因或思想认识根源。试想,倘若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是无关的,那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何须配合制度方面的建设呢?倘若市场经济只是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所谓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只需放开价格也就够了。于是,在无序状态之下,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治理秩序怎能不混乱呢?倘若改革只意味着所谓建立竞争性市场,而无需搞产权改革,那么,当然就无需去改变“人人有人人没有”的产权主体虚位状态了。于是,众人的财产权利交给有权势的人去随意支配,怎能不产生严重腐败现象呢?倘若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那么,诸如法制、道德规范、社会信用等自然也就与市场经济毫不相干了。于是,市场机制就只剩下价格与供求关系,只剩下需求背后的消费者偏好和供给背后的成本计算了,诸如坑拐蒙骗、欠债不还、假冒伪劣、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如此等等,难道不正是“合乎理性”的行为么?以“市场工具论”为指导思想来推行市场化改革,势必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事实上,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在我国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拐蒙骗肆虐、欺行霸市和操纵市场等,反映了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如打假屡打不止、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乏力等,反映出交易治理秩序的混乱;如欠债不还、偷税漏税反而被视为“有能力”或“有本事”,如政府官员参与走私,如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严重缺失等,暴露了社会信用基础的丧失和道德规范的毁坏。所有这些都环绕着我们的生活,似乎已成为日常司空见惯的现象。市场秩序混乱局面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有鉴于此,2001 年我国政府将整顿市场秩序列为一件大事来抓。而笔者认为,整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该从清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开始,尤其是首先需要深刻反思“市场工具论”这一错误认识。

(责任编辑:王胜强)